



边疆史地丛书

TANG
XIZHOU
XINGZHENG
TIZHI
KAOLUN

唐西州 行政体制考论

李方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 / 李方著.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12

ISBN 7-5316-3910-6

I. 清… II. 李… III. 地方政府 - 研究 - 中国 - 清代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4080 号

边疆史地丛书

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

Tangxizhou Xingzheng Tizhi Kaolun

李 方 著

责任编辑: 张天栋

封面设计: 陈冬妮

责任校对: 张晓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 印张 11.625 · 字数 260 千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7-5316-3998-X/D·127

定价: 19.30 元

《边疆史地丛书》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它是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国境范围时有变迁。在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边境遭到了列强的蚕食鲸吞,边界线发生了频繁的变动。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不是固定不变的。

从古代起,中国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就有密切的联系,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少差异。边疆地区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这种差异和特点,规定了中国边疆史地可以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研究中国边疆史地,探索其发展变化真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不仅是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处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边疆史地研究,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关系等敏感问题,学术界一向把它视为禁区,很少有人问津,致使这门学科长期停滞不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

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了这套《边疆史地丛书》,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和共鸣,从而把边疆史地研究推向前进。

丛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以本学科独特的方式,为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促进边疆建设,繁荣边疆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边疆史地学研究范围广泛,举凡边疆史地理论、中国历代疆域、边疆民族、治边政策、边疆开发、边疆文化、边疆外交、边疆政教、边疆海岛、边疆人物、边疆考古、边疆历史地理和近代边界变迁等,都在研究之列,其有关专著、资料和译稿,将陆续收入这套丛书之中。

中国边疆史地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一定有许多不足,甚至谬误,我们衷心地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88年12月

序

李方的《唐前期西州地方行政体制考论》即将问世,可喜可贺。这部《考论》是她的博士论文。但在攻读博士学位以前,李方致力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已有十多年的光景,单是同西州官府官吏、地方行政相关的论文,就已经发表近20篇之多。嗣后去职问学,拜师读博,不妨看作是她西州课题研究的继续和深化。待得二十余万字的《考论》一朝杀青,她这个十多年“念兹在兹”的大课题,不说功德圆满,也算是得集大成了。在李方的学术生涯中,《考论》是一座里程碑。在她答辩以前,忝为《考论》“评阅人”的我,有幸先期拜读,不禁惊喜于它沉甸甸的学术份量,写下了这样的“评议”(其中的修改意见从略):

作者对吐鲁番文书所含西州行政的学术信息提取相当彻底,新疆、旅顺、上海、日本、英国等几处庋藏尽在掌握。将相关考察分设为机构、官吏、职掌、运作等四个视角,学术视野相当开阔。分层次的丰富解绎,细致而深入。对史籍有关地方行政的记载精读深思。散见于唐人笔记、小说、碑志中的资料,钩稽甚难,作者辛勤搜出,丰富了释证。掌握中外学者的成果相当充分,有借鉴,有评鹭,有补充,有纠正。章、节、小目,条理清晰;举证繁富,立论谨严;表述准

确、平实。置局部于全局,注意把握前期西州行政体制的地域、民族特性及其作为唐朝正州之一的共性。

全文结构宏大,多层次的考释论证每含前人未发,富自得之见,创新性强,学术价值较高。虽只考论西州,但对增进唐前期地方行政体制的认识,具有普遍性启示。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也可以说是近年吐鲁番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回头来看,李方当初选定西州地方行政为研究方向,颇有眼光。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自秦行郡县起,发展至唐而臻于成熟。李唐王朝立祚久长,疆域辽阔,政情又复杂多样。它的内外朝一整套行政体制,作为现实的国家机器之主体,举凡衙署设置及运作、官员构成及职掌等,无论因革置废,大抵须揆时度势。故有唐一代的行政体制,异时异地颇见变易。就外朝行政体制而言,中原州县与西北、西南诸边陲州县(不包括羁縻州),其各自所处经济状况、军政情势、民族关系等,已然千差万别;从初唐盛唐经中唐至晚唐,时移势易,诸般情境又会有许多变化。这不同时空的种种变数,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当时当地行政体制的建构,尤其会影响它的运作。史籍如《旧唐书·职官三》“州县官员”,《新唐书·百官四下》“外官”,《大唐六典》“三府·都护·都督·州·县官吏”,以及《通典·职官典》“州郡”等,载唐朝地方各级军政体制颇详。作为李唐一统政体中的外朝体制,如上政书确乎蔚然展示了大唐地方军政体系绵密而宏大的架构。然而政书所载毕竟属于皇颁“通制”,从中既看不到地方军政的动态运作,也看不到它在长期运作中层出不穷的“权宜”和变通。而这些“权宜”和变通,往往是更本质的东西,更能揭示特定时空之下地方政体的特性,披露重要的历史真相。今

得敦煌吐鲁番文书,犹如一方方斑斓的历史化石,将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无量信息,“全息存储”式地凝聚、蕴结、定格在它的断纸残文中。这批琳琅遗珍,补苴传世文献之不足,不断召唤莘莘学子投身学术新潮流,为中国中古史研究开一新生面。李方博士正是预流其中的又一位执着的行者。

同行学者知道,敦煌吐鲁番文书解读不易。文书不同于传世典籍。传世典籍的学术内涵同它的文本名称大抵一致,如行政制度必见之于政书;出土文书的文本性质却五花八门,它的学术内涵同文本名称未必一致,如有关土地制或赋役制的重要信息,可能隐于户籍残卷或社邑名簿。古代写卷的外在形式同它蕴含的学术信息没有必然联系。学者们要想从这些“历史化石”的深处,把自己所需要的学术信息激活唤醒、萃取出来,只能靠自身学术素养的长期积累,靠“板凳须坐十年冷”(范文澜语)的执着,舍此别无捷径。人们常用“披沙拣金”、“凿璞探玉”来形容一件事艰难费功。从古文书中提取学术信息其实更难。金玉虽然深藏于沙石,但它们优良的品质和美好的外观毕竟迥别于粗砺的沙石。隐藏在古文书中的学术信息却往往了无具象,欲捕捉它,只能靠丰厚学养浸润而成的一颗“心”,从字里行间去体悟。

面对如山的“历史化石”,为孕得一颗烛照幽微的“慧心”,李方当初义无反顾决然而行,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一条坎坷长路,一走就是20年!与一般学者自定专业不同,李方从事敦煌吐鲁番学是被“逼上梁山”的。她在大学侧重于世界史。1982年自武汉大学毕业,分配来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先是安排她整理《隋唐墓志汇编》,后转入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事业在迫使她“改行”。她勇敢地接受挑战,没有犹豫。一切都几乎

从零开始。她扑下心来,从一方方墓志、一片片文书的录文做起。赖有古文献室良好的学术氛围,常得唐长孺、周绍良等名师教诲,更兼贤夫婿王素日夕襄助。好学好问的天性,“转益多师”的自觉,被她发挥到了极致。那时在许多学者面前,每每会看到李方切磋求教的身影。可她也真难啊,尤其是做了母亲以后。八十年代那些年,既要抚育幼儿,又要做学问,衣带渐宽,形容憔悴,是身体的困顿;殿堂初入,众里寻她,芳踪莫睹,怅惘何似,是心灵的折磨。难怪她每忆当年,总会说那日子满含苦涩,里面“有我的血和汗还有泪”(见本书“后记”)。

一位欧洲哲人曾把科学的入口比喻为“地狱之门”,意思是说凡有志科学事业者,他的身心须准备承受炼狱般的折磨与考验。中国的孟夫子早年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含意差似。二十年暑往寒来,李方博士终于胜利穿越了心灵的炼狱!如今谈起《考论》,她竟作如是说:“本书给予我极大的精神享受。撰写过程中,每天清晨一醒来,想到今天又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做一件重要而有价值的工作,不由得从心底里感到快乐和欢欣。”(见本书“后记”)我想,这种精神享受,该是狂风暴雨过后,坐望云霄天开的那份宁静;这种快乐,该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之后,抱望宁馨小儿的那份甜蜜。困顿苦涩升华为精神享受,血汗眼泪幻化作快乐欢欣。学术心境一百八十度大逆转,倒是又应了王国维词话的一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或者套用欧洲哲人的另一比喻来说,大约李方的学术心境,已然从“必然王国”开始迈向“自由王国”了。

张 弓

2002年1月26日于京东云鹤斋

前 言

唐朝是中国古代开发西域较为成功的朝代。唐根据当地不同的情况,在西域分别采取了三种不同的统治形式:或设羁縻府州,或建军事据点,或设等同内地的正州。正州的设立,开启了中央与西部关系的新篇章,是清建新疆行省的直接渊源,不但为唐统治西域提供了坚实的基地,而且为后世治理西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西州正是唐在西域设立的重要正州。贞观十四年(640年),唐灭麴氏高昌王国,建立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地区),该地成为唐经营西域的前沿阵地,在战略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

二十世纪以来,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大量文书,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吐鲁番学。中外学者对西州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民族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有关西州行政体制方面的研究却不多见,尤其是综合研究西州地方体制的论著更付阙如。^① 而西州地方体制却

① 学者们对西州的军事机构、政府机构中的基层乡里、邻保制度,及交通机构研究得比较多,而对西州的州级机构、县级机构研究得比较少,对西州官吏及官吏的职掌研究得更少。目前从总体方面研究西州的论著大约有以下两种:一,荣新江先生《吐鲁番历史与文化》(载《吐鲁番》,三秦出版社,1987年,54~67页),论述了西州的历史及各方面的建制。二,张广达先生《唐灭高昌后西州的形势》(原载《东洋文化》第68号,1988年,69~108页,后收入《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从军、政二个系统论述了西州的组织机构。

是十分值得研究的。

首先,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官僚体制高度发展,文书成为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所谓“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以文书御天下”,充分说明了文书在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中的管理作用,^①而吐鲁番得天独厚,出土了大批唐代原始官府文书,披露了大量有关唐前期地方官府机构的信息,为我们研究西州地方体制提供了第一手宝贵的材料。

其次,西州作为正州,建立了等同于内地的行政机构,将出土文书与史书所载典章制度作对应研究,不仅有利于揭示西州的历史,而且有助于补充、证实有关唐朝规章制度的记载。

再次,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西州地方行政体制,无论在政府组织机构方面,还是在官吏构成或官员职掌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是此地还居有少数民族部落,西州当局统治他们的方法,与统治当地编户齐民或入籍少数民族聚落判然有别,因此,西州地方体制具有强烈的边疆色彩,研究西州体制,还有助于我们了解唐朝边疆的地方行政体制。

另外,从唐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唐前期地方体制是史学研究相对薄弱的环节,虽然古代政治制度通史、地方通史都要涉及唐代地方体制,但这种研究一般来说,都比较粗略,不够深入。专门研究唐代地方体制的论著,一般来说,又都比较侧重后期藩镇的研究,而对前期的研究重视不够。个案研究如《唐京兆府研究》等,虽对地方体制作了较好的研究,但其地域仅限于首府,而对唐代一般州县来说,仍失参照对比的普遍意义。而西州既是

^① 参见叶炜先生《南北朝隋唐胥吏制度研究》,2001年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7~9页。

正州,又是边州,还是军州,其丰富的原始资料是其它任何地区个案研究所无法比拟的,因此,西州地方体制的研究,不仅对西州的历史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广泛意义上的唐前期地方行政体制的研究也有积极的意义。

所谓地方行政体制,按照笔者粗浅的理解,应包括地方机构组织、机构组织成员、机构成员职责、机构运作机制四个方面。^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前四章,分别从西州地方的机构、西州地方的官吏、西州官吏的职掌、西州机构的运作制度四个方面讨论西州地方的行政体制,第五章讨论西州少数民族部落相关问题。应该说,这五个方面内容非常多,并非本书三十万字所能容纳,因此,本书主要就比较重要的问题、彼此有关联的问题,及研究有心得的问题进行讨论。

西州贞观十四年(640)置,贞元八年(792)或十一年(795)陷于吐蕃,^② 存在了约一百五十余年,其间虽然一度与中原阻隔,但一直为唐朝的统治阵地。这一百五十多年,基本上处于唐朝的前期。^③ 西州存在的这个时限,决定了西州行政体制主要以唐朝前期特征为主,但由于时代的发展,唐后期行政体制某些特征在西州也有交叉出现。本书即以这一百五十余年历史为背景,研究唐西州行政体制的种种特征和行政体制的发展演变。

① 参见袁刚先生《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刘后滨先生《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1999年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② 陈国灿先生认为,吐蕃陷西州,大约在贞元八年(载《安史乱后的唐二庭四镇》,《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415~436页)。荣新江先生认为,陷在贞元十一年(载《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中国学术》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167~169页)。

③ 唐代分期有多种说法,此取二阶段说。即以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为分水岭,此前为唐前期,此后为唐后期。但西州的时限,与唐前期并非完全同步,其开始及结束均比唐前期后几十年。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西州都督府(州)、县司机构	(1)
第一节 西州都督府与西州政府	(1)
一、西州都督府与西州政府合署办公的前提	(3)
二、不承认合署办公难以解释的两对矛盾现象	(15)
三、西州都督府与州政府合署办公的定义及原因	(25)
四、西州都督府与州政府合署办公的条件与基础	(29)
五、西州与安西都护府的关系及与其它都督府的 关系	(31)
第二节 西州诸县及敦煌县县司机构	(33)
一、西州诸县司法司户司兵机构	(34)
二、敦煌县司兵机构及其相关问题	(50)
第二章 西州上佐、参军官员的职掌	(66)
第一节 西州上佐的职掌	(66)
一、关于上佐代行长官事	(67)
二、关于《唐六典》所载上佐的职掌	(69)
三、关于出土文书所见西州上佐的职掌	(76)
(一)别驾的职掌与别驾在州府中的作用和地位	(76)

(二)长史的职掌与长史在州府中的作用和地位	(78)
(三)司马的职掌与司马在州府中的作用	(86)
四、上佐职掌小结	(95)
第二节 西州参军的职掌	(98)
一、参军检校之职	(99)
二、参军出使之职	(111)
三、参军导引之职	(114)
四、西州参军事职掌的特点	(116)
第三章 西州官吏的兼摄及升迁	(123)
第一节 西州的兼摄官	(123)
一、西州兼摄官的概况	(124)
二、西州兼摄官的四种类型	(128)
三、西州兼摄官的特点	(137)
四、西州兼摄官众多的原因	(141)
五、西州兼摄官的作用和意义	(145)
第二节 西州摄官检校官员外官及其他	(156)
一、摄官	(159)
二、检校官	(171)
三、员外官	(176)
四、签署形式不同一般的摄(检校)官	(183)
第三节 西州官吏的本地升迁	(188)
一、西州文官的本地升迁	(189)
二、西州武官的本地升迁	(206)
三、西州文武官吏升迁小结	(220)
第四章 西州官府的运作及相关制度	(228)

第一节 西州官府公文运作及相关制度	(228)
一、西州公文运作及长官、判官的作用地位	(229)
二、史籍中地方公文运作及其相关制度	(249)
第二节 西州官府点检制与上值制	(265)
一、西州官府点检制度	(265)
二、西州官府上值制度	(274)
三、西州职掌点检上值事务的部门和官员	(282)
第五章 西州少数民族部落及其相关问题	(288)
第一节 西州城傍朱邪部落	(289)
一、朱邪部落与沙陀部落的关系	(289)
二、朱邪部落隶属西州都督府	(301)
三、朱邪部落迁西州的原因及时间	(307)
四、朱邪部落与北庭、西州关系比较	(314)
第二节 西州西突厥游弈部落	(320)
一、有关西州突厥部落的材料及研究概况	(320)
二、有关西州突厥部落的难点、疑点问题探讨	(323)
三、突厥部落与编民及西州当局的关系小结	(334)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338)
后记	(350)

第一章 西州都督府(州)、县司机构

西州军政机构是一个庞大的地方组织体系,举凡都督府、州政府、县府、乡里、城坊、折冲府、天山军、镇戍、烽以及长行坊、馆驿等等军政交通机构无不完备。然而,全面讨论这些组织,非本章所能容纳,综述这些机构,又违本书“研究”之宗旨,因此,本章仅拟讨论前人研究较为薄弱,而西州军政机构中较为重要的问题。第一节,拟重点讨论西州州级机构中都督府与州政府的关系问题;第二节,拟重点讨论县级机构中的诸司问题。

第一节 西州都督府与西州政府

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高昌,建西州(今吐鲁番地区),西州成为唐经营西域的主要根据地,安西都护府曾一度设立在此。显庆三年(658),唐彻底打败西突厥,领有整个西域,都护府迁至西域中心龟兹,西州改设都督府。

陈国灿先生曾对安西都护府与西州的关系作过研究,他认为,贞观年间安西都护府治西州时,二者应是合署办公的关

系，这个状况历经郭孝恪、柴哲威、麴智湛，一直维持到显庆三年安西都护府迁龟兹时。^①然而，显庆三年后，西州都督府与州政府是个什么关系？论之者则甚少。^②一般学者仅限于附议，即在论述金山都护府与西州关系时，或在讨论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关系时，有所涉猎。有学者认为，金山都护府建，西州都督府废；^③有学者认为，安西都护府撤回西州，都督府降为州政府。^④笔者根据大量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认为情况并非

-
- ① 陈先生根据阿斯塔那 221 号墓《唐贞观十九年（645）安西都护府下军府牒为速报应请赐物见行兵姓名事》指出：“（安西）都护府下符给交河县，中间没有经过西州这个环节，由此看在显庆以前的西州，实际是安西都护府在行使州官的职权，而西州虽有其名，实无其制。……贞观十六年，唐朝任命郭孝恪为‘金紫光禄大夫，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后，长官的一身二任使西州建制很可能也并到了安西都护府合署办公，由安西都护府代行了西州的职权。”又说：“（柴哲威）同样身兼西州刺史，大概仍保持了合署办公的传统。永徽三年继任的麴智湛仍是如此。”（《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与唐史研究》，《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 年，295～296 页）。
- ② 一般说来，都督府与州政府的关系即是唐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史学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督府问题研究较多，如严耕望先生有《魏晋南北朝都督与刺史之关系》、《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约论》（分别载《大陆杂志》第 11 卷第 7 期、第 27 卷第 4 期）；陈仲安先生有《都督散考》（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料》第 6 期，63 页），等等。但唐代都督府问题研究则甚少，如《大百科》隋唐五代史卷《都督》条，仅述东汉末至唐都督府的源流，并以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督府的情况为主。原因大约即是学术界对唐代都督府问题研究不足，另外，与魏晋南北朝为都督府的全盛期亦有关。
- ③ 如薛宗正先生说，“龙朔三年（663）西州都督府晋级为金山都护府以后，这一建置本已不复存在”，至永昌元年（689）西州都督府乃复置。而且“复置之西州都督府不治西州而治庭州”（《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145 页）。
- ④ 如王小甫先生说：“每当安西都护府迫于形势迁回西州时，西州都督府建制便改为州而由都护兼领。”（《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53 页）刘安志先生亦认为：“安西都护府撤回西州，促使原有的行政建制又得重作调整。西州都督府降格为西州，……永昌元年（689）七月以后，西州改为都督府。”（1999 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唐朝西域边防研究》，7 页）